

## 吳序

父親全集出版在即，我願意講幾句話，祝賀這件大事終於成爲現實。

人生接近謝幕之際，我有三個夙願，也是我的使命。

第一，將父母骨灰從交通不便的北京遠郊遷回上海。他們在上海工作了半個多世紀，成家立業，在此作爲最後長眠之地，順理成章。父親誕生一百周年前夕的 1993 年，三自曾考慮把父親骨灰安葬在上海龍華的宋慶齡陵園。按照父母的遺願，兩人應該合葬，但最後不得不作罷，因爲上層認爲母親的政治級別未達要求。2006 年，克服重重困難，未經有關單位同意，我們終於將骨灰遷出北京，安葬於上海青浦的福壽園基督教陵園。由於基督教三自的干預，陵墓比原先設想的大了好幾倍，有違我們的理念。爲此，時常感到內疚不安；青浦原是良田萬頃，而今大片土地被墓園佔用，情何以堪。

第二，父親是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正面的褒和反面的貶，分明有如涇渭。爲了去除偏頗，還原一個真實的父親，我寫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一文，其中寫的都是憑良知道義而發的真話實話，有根有據，揭露謊言，揭示真相，希望能經受歷史的考驗，但卻遭

到封殺，在一元化的控制下，竟然找不到願意發表的刊物。2010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父親的研討會，在自由的環境中，才有機會發表我的紀念文。雖然此文受到大陸的杯葛，但通過各種管道，已慢慢滲透入去，讀者的回饋認為對父親的評價公允持平。我相信，隨著時代的演變，我國一定會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能回歸文明的主流，不再動輒禁文禁書。

第三就是出版父親的全集，就是現今所要慶祝紀念的。父親一生作過無數的演講，寫過眾多的文章。要了解他，研究他，要跟蹤他思想發展變化的軌跡，就必須系統看他所寫的所講的。言為心聲，我認為父親光明磊落坦蕩，並無嘩眾取寵，並無言不由衷，他所寫的，他所講的，就是他所想的，主要是指1949年前的著作。全集的出版就給學者讀者提供了全面研究的可能。

父親並不是一個偉人大師，但作為一個中國社會基督教信仰者，他也有他的代表性。雖然他是三自運動的領頭人，雖然他是中共的竭誠的擁護者，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基督教已被邊緣化，被閹割，當局不可能會鼓勵人們去全面疏理研究父親的思想，特別

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也不可能動用人力物力出版他的全集。爲此，全集的出版只能在境外進行，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數年前我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邢福增先生進行此項極其浩瀚繁雜的任務。先生對中國基督教研究有年，代表性的專著有：趙紫辰神學論集，陳崇桂的神學思想，王明道、倪柝聲的研究及中國共產黨與基督教等許多論文，並曾撰寫幾篇力作，對父親詳細論述，以及爲台灣出版的《黑暗與光明》一書編註和撰寫前言。先生學風嚴謹，一絲不苟，所採用的資料，務必謹慎核實，爲我紀念文所作的註釋，更是詳盡信實，委託他主持全集出版，實是深慶得人。先生承接以來，奔波各地，遠及歐美，收集到的資料，有的極其珍貴，如 1947 年，在英國愛丁堡青年會代表大會演講的英文記錄稿。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父親是三個被邀發言者之一。發言的最後一部分，強調了要用基督教的方法看問題，強調了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優越性。發言受到廣泛的好評。那是中共奪得政權的前兩年。

最後，全集共收中文約 150 萬字，英文約 18 萬字。在此，對先生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謝敬佩。

全集包括的文章，大部分寫於 1949 年前，也有的發表於「解放」後，那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查，敬請讀者審視當時的時代背景。

1949 年前後發表的文章有很大區別。不同點在於，前者反映了父親真實的思想——爲社會現實鳴不平，爲民請命，對百姓當時的苦痛不幸無望，百般同情，對基督教寄託無限的希望，期待它能拯救世人，創造一個平等博愛民主自由的新世界。有些思想（如唯愛），無論國人能否認同，也是父親當年的真情實意，代表了基督教一方思潮。

1945年勝利以後，他的激進言行，已受到國民黨政權的特別注意。李公樸、聞一多都是父親往來很多的好友，慘遭暗害後，當局有一份數百人的黑名單，父親也名列其中。沒有下手，因為父親國外關係密切，顧忌到國際，特別是美國輿論的反響。1949年政權轉手前夕，這份黑名單又再度出籠。

當年父親主編的《天風》，有偏激色彩，傾向性明顯，民主問題是關注的重點，因此從第三期以後，幾乎每一期都有一兩篇文章被當局所刪，或被扣呈重慶圖審會。

我本人對《天風》1946年的復刊詞，對1948年〈甘地不朽〉，對1947年在浙江大學所作的兩次演講等，深有共鳴。這些文章鏗鏘有力，發人深省，時至今日，依然有現實意義，依然有生命力。

明顯對照，1949年以後的文章，已很少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有的是，秉承執政者的意圖，改造教會，和資本主義劃清界限，使之適應社會主義。還有大量文章，主要是表態支持現行的政策，對新政權歌功頌德，如擁護歪曲歷史真相的抗美援朝。這也難怪，當局蓄意掩蓋歪曲真相，大部分國民被愚弄至今，父親豈能例外？令人最難認同的是〈光輝燦爛的十年〉一文。那是1959年反右運動後，55萬（三百餘萬）知識分子入了另冊，淪為賤民，那是餓死幾千萬人大饑荒的開始，我們都親身經歷過，那是階級鬥爭的十年，冤假錯案如山，現實絕非光輝，也絕不燦爛。

有人懷疑，父親有些文章和講話有背後的捉刀人。丁光訓1988年就私下派學生去上海了解，父親晚期發表在《天風》和報刊上的一些文章是否本人親自撰寫。參看余杰訪談孫家驥（發表於《大地的麥子》，台灣雅歌出版社，2013年），孫曾就讀於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一九八八年冬，丁派我們研究科七位學生去上海採訪一些「老三自」，為要編出《吳耀宗小傳》。當時，全國兩會的「老三自」沈德溶已經出版了一本《吳耀宗小傳》，沈德溶曾在上海與吳耀宗共事多年，我們幾個學生憑著幾天的採訪，無論如何都不會寫出比《吳耀宗小傳》更有價值的東西。但這個看似多此一舉的行動，實際上是附帶另一個「秘密使命」——丁私下吩咐我和另一位來自上海的同學，要我們特別瞭解，但又不能公開詢問的一件事兒：吳耀宗晚期發表在《天風》和報紙上的一些文章是不是他本人寫的。後來我意識到，丁是有遠見的，他不想在晚年神志不清的時候被人利用。

有人曾經問我對上述引言的回應。我亦有所聞，但查無實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常有機會參加父親和親近同事的午餐會（常在上海粵菜館新雅飯店），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左派」。三自每日相處的關鍵人物秘書長就是李儲文。父親完全被「左派」所包圍，他所寫的文章報告，有人代筆，不是沒有可能。即使沒有人代筆，也絕對要經過討論修改過濾。接見外賓，必定有「陪同」（經常是施如璋、劉良模、李儲文），以保證談話沒有偏離主流，大方向正確。有照為證。

全集不可能成為暢銷書，目前也不可能進入國內公開發售。出版的目的，是立此存照，為歷史留下一個忠實的紀錄，因此，我願意出資印行。

至今，三個夙願都已實現，我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安度餘下的歲月？否。縈縈於懷，揮之不去的還有父親四十大本的日記。父親去世後沒有幾天，當局就派人來取走全套日記。說是暫借，可是

言而無信，扣壓了三十年後依然拒絕歸還家屬。這樣的處理，於情於理於法，實在難以理解，與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國形象並不相稱。

說名人的日記是國家的財產，不能歸還。名人如何定位界定？是否有國家法理依據？還是某些人士心血來潮的恣意所為？父親即使歸入中國名人之列，那也是過氣的名人，邊緣化的名人，早就是一個不便多提及的歷史人物。如今有幾個國人還知道有吳耀宗其人？即使在基督教界，大多也是只聞其名，不知其實。當年由京遷葬上海時，我們原先選中的一小塊墓地，鄰近沈以藩墓，但是福壽園基督教園區的負責人，卻不同意給我們，說是預留給基督教的知名人士，至少是主教級別以上。

日記歸家屬所有，已成為世界不成文的慣例。扣住不還，徒增國際輿論的詬病。多年來有不少友人表示願意幫忙索還日記，甚至提議訴諸法律途徑，本人深知國情，只有沉默搖頭以對。其實，歸還日記只是國家大事中一件芝麻小小事，但走出這一小步，可以改善國際觀感，展示我們的軟實力。

2013年4月24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了國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長答記者問。

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工作最深刻的變化，就是由主要依政策辦事向依法管理轉變。用法制的方式處理宗教問題。

……管理要有理、有據。

試問，按照新政，「用法制的方式處理……有理、有據」，是否應該主動歸還父親的日記？我今年（2014）已經84歲了，餘下的

日子已經無多，有生之年，是不是還能見到父親的日記完璧歸趙？希望這不是奢望，希望不再令我失望！

上文寫就至今，又有一段時間，其間曾作最後努力，去信中央及上海統戰部負責人，再次婉請歸還家父日記。遺憾的是，去信，依然一如過往，石沉大海，渺無音訊。我的希望轉為失望，徹底的失望。如今求告無門，收回日記，已不現實。一個政權，號稱是先進的，人民的政權，竟然銳化到有法不依，言行不一，言而無信。在日記處理上，跡近強取豪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誠哉斯言。

在目前的條件下，只有將手頭已有的日記摘抄和「自述」（檢查交代），和全集一併發表，這些都是父親的思想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不同的表達，這樣處理應當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父親的摘抄是爲了寫檢查，秘書計端蘭的摘抄是爲了寫傳記，即其後《吳耀宗小傳》的原稿。兩份摘抄各有側重，但都是全部四十冊日記的一部分，極小的部分。檢查交代原本是要上交入檔的，竟然遺留了一部分（前半部）在我手中，則純屬意料之外。

希望全集有助於對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對了解評價真實的父親有所裨益。

吳宗素